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一六期 ——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10d)

【史实辨析】	1971, 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	蒋 健
【百家争鸣】	“九一三事件”没有阴谋吗? ——兼答余汝信先生	舒 云
【当事者言】	参加罗瑞卿专案组屡遭批判审查	张英华
【文革一页】	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张一虹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实辨析】

1971, 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

• 蒋 健 •

《罗荣桓传》和《罗荣桓年谱》的主要作者黄瑶最近撰文说: 1971年“4月19日, 林彪返回北京。在京期间, 林彪在公开场合露面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五一劳动节晚间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放烟花。第二次是6月3日,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和周恩来作陪。这两次, 林彪见到毛泽东都形同陌路, 而且都在活动中不辞而别。”〔1〕

据笔者所知, 有关林彪在1971年的公开活动中与毛泽东不辞而别的说法, 最早出自当年的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 他不仅回忆了1971年“五一”劳动节上午林彪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上天安门城楼的情节, 还声称当晚的焰火晚会, 林彪因为要抽大烟本不想参加, 后经周恩来再三劝说后, 才不得不中断抽大烟, 姗姗来迟, 到场后却始终不同毛泽东打招呼, 而毛泽东对林彪也视而不见, 林彪仅仅坐了几分钟, 便不辞而别。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 表示了毫不介意的大度。林彪在城楼上不辞而别后, 再在镜头上出现已是6月中旬, 当时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来华访问, 林彪陪同毛泽东接见。林彪再次提前离开会场, 坐在外面忍受着大烟瘾的折磨……〔2〕

杜修贤的说法，尤其是关于林彪五一劳动节晚间不辞而别的说法，不仅为许多专业的党史专家和专著所采纳，比如，高华就多次说：“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3〕、“林彪当着西哈努克的面负气而去，……，毛主席的手下没有一个敢这样的”〔4〕，《周恩来年谱》有“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不辞而别”的辑录〔5〕，《毛泽东传》也有“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的叙述〔6〕，而且通过作家顾保孜的《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摄影师眼中的晚年毛泽东》和《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之类畅销书广为公众所认知。

◇ “五一”节焰火晚会，林彪未迟到，早退请了假

实际上，1971年“五一”节那天上午，天安门城楼根本没有什么领导人参加的活动。

至于当晚的事情，时任林彪警卫队中队长的肖奇明回忆说：“5月1日，……林彪只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了一会儿，就给毛主席请假，说‘身体不舒服’，马上就回家了。”〔7〕另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邱会作回忆说：5月1日夜，毛泽东、林彪在黄永胜陪同之下同时登上了天安门。放了一轮烟火之后，林彪指着自己的头向毛泽东说：“我头疼，早点退场。”毛泽东回答说：“好。今天没有什么题目了。”邱会作还回忆：林走后，毛也进休息室了。叶群见机马上进去同毛谈了近两个小时，谈完后她很高兴，并告诉邱会作等人：“主席同我谈的很好，谈笑风生地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和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8〕

由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可见，林彪当晚未迟到，早退前也向毛泽东请了假。

从1971年5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上，也可看出林彪当晚并未迟到，因为头版上有两张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其中第二张照片的图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更能说明事实真相的是，当年的新闻影像清楚地记录了毛泽东和林彪一起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宾的画面，更有林彪在城楼上落座后笑容满面的镜头。〔9〕

也就是说，尽管内心有不满，但林彪在公开场合仍然对毛泽东表现出其一贯的恭敬，并非“见到毛泽东都形同陌路”。

当然，因为身体的原因，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停留的时间确实较短，以致于江青当晚都没有和他说上话，甚至有可能没看见他，所以江青在第二天打电话给叶群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10〕

◇ 林彪是否求见毛泽东遭拒呢？

那么，6月3日，在毛泽东接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林彪会不会见到毛泽东形同陌路，而且不辞而别呢？

让我们看一下，自劳动节晚会后的一个多月中，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什么？

李文普回忆：“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谈话。当时，毛主席那边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时间毛主席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1〕

吴法宪也回忆：“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12〕

很多学者，比如王年一〔13〕、高文谦〔14〕和高华〔15〕，就曾持林彪求见毛泽东遭拒的见解。

事实果真如此吗？

根据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回忆，“九一三事件”以后，从毛家湾查到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一个信稿，内容是：“毛主席：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16〕

吴忠还回忆，林彪的这个“四不一要”的信稿最终并“没有送到毛主席那里，是授意、起草、修改、抄清，据了解完了以后放了三天，林彪考虑不送了。”〔17〕

这也就是说，并非毛泽东拒绝了林彪的约谈请求，而是林彪本人在仔细权衡利害之后，最

终打消了与毛泽东好好谈谈的念头。

林彪5月23日的信稿反映了他当时的所思所想。笔者认为，该信稿的核心内容就是希望十年不动他的班底。实际上，从庐山会议的风头转向开始，林彪就十分注意对自己班底的保护。

从信的内容看，尽管林彪承认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承认“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承认只有毛泽东才可以“面授机宜指示”捉、关、杀“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而且为了让毛泽东放心，林彪还主动提出将原属于四野的三十八军调离北京，但林也有以守为攻的策略考虑，“一要”让毛泽东有专断权的同时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四不”可收笼络人心之效，毕竟“文革”折腾了五年，无数昔日政要的落魄令此时的中共高干，不止黄、吴、李、邱，都怕过朝不保夕的日子。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康生、张春桥也有疑似“叛徒”的小辫子抓在别人手里。

此外，林彪采取的仍然是“不自责”——不做自我批评的态度，而当时最让毛泽东恼火的事情就是林彪始终“不自责”。

笔者认为，毛、林关系的恶化一定程度上就坏在林彪始终“不自责”的态度上。而林彪信稿中建议的十年内对现任高官“实行四不一要”以及“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的做法，特别是提到对“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的预防，无异于是和毛泽东在讨价还价，因此只会徒增毛泽东的反感，而无助于事情的解决。而且，周恩来在林彪和他谈此事时已经委婉地表达过“有这个必要吗？”的异议。（18）也就是说，周恩来并不赞同林的这个想法，因为林信一旦上达毛泽东，还会引起毛泽东对林彪一周恩来默契甚或“结盟”的猜疑。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这个信稿充分反映了他的“丘八”本色和个性：“四不”的诉求太直白；明明是请求，可开篇就要求“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这显然不是一个副职该有的说话口气；对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以“乱令”称之，把对立面的人看作“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而这难免被毛泽东认为有影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嫌。

因此，笔者认为，林彪最终没有送出此信，除了他自己的反复考虑之外，比如想起了彭德怀1959年7月在庐山写信却被毛泽东判定为“下战书”后的下场，还可能受了周恩来意见的影响，更可能是曾经被毛泽东称为“八级泥瓦匠”的叶群进行了干预，毕竟5月1日夜，叶群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得很好”，而且在5月中旬，她奉林彪之命，和黄永胜、吴法宪一起同江青有过一次效果良好的“谈心”（19），所以叶群不想让林彪节外生枝。

◇ 林彪不可能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齐奥塞斯库时不辞而别

从前面介绍的背景看，林彪不可能在6月3日上午陪同毛泽东会见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与毛泽东“形同陌路”，而且“不辞而别”。从当时的新闻图片看，林彪见了毛泽东还是一副“紧跟”的表情，而且心情不坏。

实际上，当时林彪对江青都是虚与应酬，甚至有些低声下气，比如他5月14日叫叶群约着黄永胜、吴法宪去看望江青，尽管黄永胜、吴法宪在此前已经去看过江青；在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去过之后又问候江青。（20）说穿了，林彪就是通过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向可以上达天听的江青示好，甚至示弱，这个时候，他本人怎么可能会公开、直接冒犯毛泽东呢？

虽然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有出席当天举行的招待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宴会，但没有参加毛泽东和林彪先前接见活动的江青和叶群代表他们出席了。

◇ 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多月林彪干了什么？

毛泽东和林彪在6月3日的见面中没有发生不快的另一个佐证就是几天后江青主动打电话给林彪，说：“主席说林副主席学习最好。我想给你照一张学习毛选免冠像，命题叫‘孜孜不倦’。请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到我住处来。”（21）林彪、叶群连续两日赴约到钓鱼台江青处照相。（22）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这次照相以及照片随后的发表，使得林家上下都认为他们摆脱了自庐山会议以来所处的困境：6月11日，叶群告诉江青：“林彪同志的照片收到了。林彪同志说照的非常好。”6月13日，叶群又告江青：“照相的问题，我向法宪同志讲了，他们说对他们鼓舞很大。”6月22日，叶群再告江青：“《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用林彪同志照片问题，我报告林彪同志了，林彪同志说还是用看毛选的好。”（23）叶群在照片正式刊出后，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相太好了。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林彪同志看了以后非常高兴。”（24）林立果对其同伙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叶群检讨过关了。江青也作了姿态……”（25）

还需要一提的是，黄瑶说林彪全家是6月15日到北戴河的（26），而实际上林、叶是7月18日才离开北京并到达北戴河（27）。那么，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多月中，林彪、叶群主要干了什么呢？他们大概以为难过的日子过去了，在毛家湾住地搞起了装修。林彪本人则因毛家湾大兴土木，搬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居住。（28）7月10日晚10点，叶群甚至还亲自到文物管理处“挑选”文物，而且去之前一周，文物管理处就被电话告知“首长要来”。（29）此外，林彪、叶群一双儿女的婚事也在加紧筹划了。

◇ 林彪最终不辞而别

至于毛泽东，他一定会从周恩来那里获知林彪有过想和他面谈的意图，而且会写信向他请示。尽管毛泽东不完全清楚林彪想谈什么，但他期待的是林彪会主动向他做些自我批评。然而，林彪在6月3日同他见面时并未做什么表示，此后也没有任何表示。从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前夕说的“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30）这番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为没接到林彪的约谈请求而失望、恼怒过，甚至迁怒于叶群。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认为无论从治国理念，还是组织路线，林彪都不符合他的期望，所以他要通过“南巡”为最终换下林彪而造势。

扯远了，回到主题：要说1971年林彪从不曾对毛泽东不辞而别也不属实，9月13日他踏上不归之路时就未与毛泽东辞别，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注释：

（1）黄瑶：〈叶群的性格与命运〉，《党史博览》，2013年6期。

（2）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转引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7—76页。

（3）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总97期。

（4）高华：《再探林彪事件幕后（下）》，《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9期。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

997年，455页。

- (6)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591页。
- (7) 肖奇明：〈亲历“九一三”〉，《军休之友》，2006年7期。
- (8)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778页。
- (9) 1971年五一劳动节视频：www.tudou.com/programs/view/R3Ax4M2cY0g/
- (10) 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四）〉，《武汉文史资料》，2012年4期。
- (11) 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2期。
- (12) 《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860页。
- (13) 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2期。
- (1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322—323页。
- (15) 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总97期。
- (16) 吴忠口述，陈楚三、李大震整理：〈吴忠谈“九一三”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1期。
- (17)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 (18)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 (19) 李耐因：〈“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炎黄春秋》，1997年7期。
- (20) 李耐因：〈“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
- (21) 李耐因：〈“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
- (22) 杨银禄：〈林彪《孜孜不倦》照片背后的故事〉，《党史博览》，2010年1期。
- (23) 李耐因：〈“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
- (24) 杨银禄：〈林彪《孜孜不倦》照片背后的故事〉。
- (25)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00页。
- (26) 黄瑶：〈叶群的性格与命运〉。
- (27) 杨子万：《“九一三”事件后的山海关机场》，《党史博采》，2001年1期。
- (28) 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229页。
- (29) 章润青：〈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窃取文物记〉，《百年潮》，2004年1期。
- (30)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75页。

□ 原载《记忆》第101，102期

~~~~~

## 【百家争鸣】

“九一三事件”没有阴谋吗？——兼答余汝信先生

• 舒 云 •

余汝信在2013年5月编著出版了《“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一书，本文主要质疑署名余汝信的文章《〈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

首先声明，由舒云整理、明镜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林豆豆口述》一书，并不是如余汝信所说“部分改写”“大量改动”。而是在没有改变原作内容的前提下，作了个别文字的技术处理和个别史实的订正。

### 1、“九一三事件”谁该负责？

余汝信承认“林豆豆的材料反映了‘九一三’当晚的大致经过”，而余汝信的“解读”却没有反映这个“大致经过”。

余汝信试图对“九一三事件”作一番新的诠释，把“九一三事件”的责任完全推给林立衡（林豆豆），从而回避了林豆豆上诉材料中最关键的部分，即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从开始全力支持林豆豆并报告上级，到后来却消极应付，甚至奉上级指示让林豆豆等人也一起上飞机，直到最后眼睁睁看着林彪专机起飞。

“九一三事件”中谜团很多。林彪是否知道毛泽东南巡谈话？如果知道，林立果、叶群是如何转达的？林立果、叶群的“三套方案”林彪清不清楚？林彪为什么在服安眠药后，半夜出走？是什么原因导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谁应该对“九一三事件”负责？……

表面看“九一三事件”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只要把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泽东的种种言行结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林彪的“步步进逼”。关于这一点，余汝信也承认，并指出毛泽东“步步进逼”之一是让叶群写检讨；“步步进逼”之二是毛泽东南巡。可是，余汝信却没有指出“步步进逼”之三欲擒故纵。

众所周知，“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线就是1971年9月12日中午，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直接导致林立果调林彪专机返回北戴河。如果当晚林彪专机不在北戴河，怎么可能半夜“机”叫？表面看，林彪半夜出走源自林豆豆向8341部队报告。但是，林豆豆报告的本意是请求8341部队保护林彪不走。如果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拦阻，林彪是走不了的。为什么北京不下命令拦阻？

林豆豆在上诉材料中如实记下她所经历的“九一三事件”。余汝信承认：“林立衡（林豆豆）的材料总的轮廓，还是反映了1971年9月12日当晚北戴河所发生的事情的大致经过的。”但他又说：“这并不等于说它完全真实地反映了林立衡当时的思想活动，不等于说它准确无误地反映了事件的全部细节，更不要说笔者赞同林立衡在这一事件中的处理方式。”

从林豆豆的叙述看，她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父亲留在北戴河最安全，无论如何不能让父亲走。难道这不是林豆豆的真实思想吗？余汝信怎么知道林豆豆上诉材料没有“完全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思想活动”？至于“是否准确无误地反映了（九一三）事件的全部细节”，就更有求全责备之嫌了。“九一三事件”不止一个现场，其他现场，如山海关场站，如林办值班室等，都有另外的当事人反映。当事人只要反映自己所见的细节就足够了。

余汝信说：“在‘九一三’中林立衡是否执行林彪的‘意志’和‘嘱咐’？”余汝信认为林豆豆在最后五天中没有与父亲沟通，不能代表林彪的意志。

这就奇怪了，最后五天没有与林彪沟通，就不能代表林彪的意志？难道林彪在最后五天的意志与以前不一样吗？那么请余汝信举出林彪另外的意志。如果林彪真的在最后五天改换了一种意志，那林豆豆没有与父亲沟通，恐怕就不能代表林彪的意志。问题是“林办”工作人员没有一人揭发出林彪在最后五天改换了意志，既然林彪一如既往，林豆豆怎么不能代表林彪意志呢？

什么是林彪意志？林彪有“杀害毛泽东”的意志吗？林彪有“逃往苏联”的意志吗？换句话说，林彪在北戴河有任何出走境外的物质或精神准备吗？如果有，为什么林办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揭发出来？根据现有材料，林彪内勤倒是“揭发”出林彪说过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个“民

族主义者”难道不是林彪的意志吗？林豆豆请求 8 3 4 1 部队不让林彪上飞机，不就是代表林彪的这个意志吗？林彪有什么理由背叛他流血流汗百死一生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更明确地说，他有什么理由背叛毛泽东？从林彪那封 5 月份未发出的给毛泽东的信就可以看出，林彪还是在向毛泽东低头表忠，希望得到毛泽东的谅解，丝毫没有背叛之意。

林豆豆五次报告和请求，都是希望 8 3 4 1 部队保护林彪，不让林彪上飞机！林豆豆并没有向中央报告，向中央报告的是 8 3 4 1 部队的副团长张宏。而中央〔7 1〕5 7 号文件却完全不顾事实冠以“林豆豆报告”。而余汝信不仅与中央〔7 1〕5 7 号文件异曲同工，而且更进了一步，说林豆豆“实际上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大义灭亲。”

“九一三事件”中，确实有人在“大义灭亲”。但不是林豆豆，而是应该为“九一三事件”负责的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及时下令拦阻，林彪连山海关机场也去不了。而事实是“上级”不仅不拦阻，反而让林豆豆他们也上飞机。

为什么余汝信闭口不提“九一三”当晚的种种怪异，却把责任全推给林豆豆？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中的做法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林豆豆不应该为“九一三事件”负责。余汝信把“九一三事件”的全责任推到林豆豆身上，就有违事实了。

## 2、是谁的阴谋？

余汝信指责林豆豆不让 8 3 4 1 部队向林彪报告，向上级报告，是给 8 3 4 1 部队出难题。林豆豆不让 8 3 4 1 部队向林彪报告了吗？林豆豆只是讲了自己为什么不向林彪报告的理由，是 8 3 4 1 部队副团长张宏主动说“就是不要向林彪报告”。据 8 3 4 1 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回忆，张宏根据上级指示，要上去向林彪报告，被他拦住了。姜作寿的理由是张宏上去，他也跟着上去，林立果有枪，万一他们两个指挥员都回不来，部队谁管？而且 8 3 4 1 部队是外卫，从来不进林彪房间。这样，张宏就没有上去向林彪报告。

至于林豆豆不让张宏向北京报告，只是提出个人意见。她以为请求 8 3 4 1 部队就能保护父亲当晚不走，没想到还要“惊动”北京。而 8 3 4 1 部队只是警卫，除非“上级”下令，否则没有权利阻止林彪出行。这也就决定了 8 3 4 1 部队副团长张宏必须向上级报告。林豆豆不是 8 3 4 1 部队的上级，林豆豆同意与否，都不能阻止 8 3 4 1 部队向上级报告，何来“出难题”？

余汝信说：“‘九一三’是 8 3 4 1 部队碰到的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关键在于对中央上层斗争毫不知情的在北戴河的 8 3 4 1 部队，直接面对的这场突发事件的当事人，是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党的唯一副主席！面对这一场建国以来高层警卫工作中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事件，8 3 4 1 部队根本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也根本没有处置预案可资遵循。即使处理得手忙脚乱，不尽人意，那又如何？又从何谈得上有什么‘阴谋’？！”

这一大段看似有理，但事件正在进行中，谁能知道这是“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事件”？实际上 8 3 4 1 部队面对“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并没有如余汝信所说“处理得手忙脚乱，不尽人意”，他们向上级报告了。问题是“上级”超“冷静”，不下令拦阻，反而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态度？难道是欲擒故纵？

余汝信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证，在‘九一三’当晚，毛、周或 8 3 4 1 部队有任何令林彪出走的阴谋。一切关于‘阴谋’的猜测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臆想，都缺乏确凿的证供。”



谁说周恩来、8341部队在九一三事件中有“阴谋”了？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中只是一个“傀儡”，决不敢越雷池一步。至于8341部队更是与“阴谋”无关。确如余汝信所说：“当张宏的直接上级没有明确指示时，他只能按兵不动，当有明确指示时他只能照原样传达，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上级没有命令拦阻林彪专车和专机，8341部队当然不能拦阻。

但是，周恩来和8341部队没有阴谋，不等于“九一三事件”中没有阴谋。“九一三事件”是有阴谋的，阴谋来自毛泽东。为什么8341部队的“上级”不下命令？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拦阻林彪？为什么毛泽东要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就是网开一面放林彪走吗？

1980年“放跑林彪飞机”成了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的罪证之一，李作鹏当时远在北京，对当晚北戴河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而且林彪专机是强行起飞，与海军山海关机场无关，更与李作鹏无关。如果李作鹏放跑林彪是罪，那么8341部队“上级”不下拦阻命令，放跑林彪专车，是否也应当承担罪责？

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回忆：“如果下令，肯定能拦住林彪。”因为始终没有接到“拦阻林彪”的命令，追到山海关机场的8341部队官兵眼睁睁看着林彪专机飞进黑暗中。试想，如果毛泽东不让林彪走，一声令下，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不要说荷枪实弹几百人，就是只有几个人，十个林彪也走不成！

“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吴法宪为什么要潘景寅把飞机飞回北京？周恩来为什么下达“联合命令”才能起飞？为什么打电话劝说叶群不要夜航？为什么把黄永胜“软禁”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一向分而治之，九届二中全会黄永胜在北京值班，中途由吴法宪换黄永胜上庐山。1971年9月12日晚上，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家办公。这是偶然巧合吗？接了周恩来的电话后，叶群找不到黄永胜了，终于连夜拉林彪出走。

余汝信认为“九一三事件”中没有阴谋，完全是“突发事件”。“九一三事件”是“突发事件”吗？“九一三事件”是孤立的“当晚”那几个小时吗？没有九届二中全会，没有华北会议，没有批陈整风，没有毛泽东南巡谈话，能有“九一三事件”吗？如果没有阴谋，毛泽东南巡讲话反复讲林彪坏话是什么意思？符合党的原则吗？党的主席对党的副主席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多次请求与毛泽东面谈，都被挡回或置之不理。难道这不是打“草”惊“林”、步步进逼吗？难道这是余汝信说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与阴谋无关吗？

### 3、毛泽东怕林彪跑吗？

余汝信认为：“九一三事件”不仅出乎自诩料事如神的毛泽东意料之外，更出乎周恩来与林办所有工作人员及8341部队的意料之外。余汝信怎么知道“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周恩来会是意外？林办工作人员、8341部队意外是有可能的，而毛泽东、周恩来怎么可能意外呢？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泽东针对林彪的一系列战略部署，都是在挖林彪的“墙角”。而且毛泽东专门让华国锋把他南巡讲话纪录稿送给周恩来看，里面说了林彪那么多坏话，说他要管军队了等等。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周恩来能看不出毛泽东要打倒林彪的意图吗？

至于毛泽东更不会意外了。

毛泽东放出话来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这不是明摆要处理林彪了吗？林彪不会不记得，打倒彭德怀时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打倒刘少奇时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九届三中全会应该是林彪的政治末日了。毛泽东胸有成竹，即便林彪不跑，叶群和林立果能不想跑吗？至于“九一三事件”这样或那样的过程，毛泽东并不关心。

余汝信说：“如果（林豆豆）及时地直接向周恩来报告了，会更有利于北京准确判断北戴河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周要是马上采取断然措施阻止事态继续发酵，结果可能完全改观。”余汝信的这个猜测就是一厢情愿了。

“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不到半天，在这个极短的时间里，林豆豆从始至终都没有想向中央报告，当然更不可能向周恩来报告。林豆豆非常清楚，举凡涉及到林彪这位“副统帅”、“接班人”之事，周恩来都无权作任何决定。虽然林彪和他的关系很好，也帮过他不少忙。但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中间，周恩来当然要站在毛泽东一边，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也被拖下水。所以，周恩来怎么可能不经过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呢？1971年9月12日深夜，周恩来给叶群的电话，也只是以夜航不安全为劝阻。

谁能阻止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的行踪？只有第一号人物毛泽东。林彪专机即将飞越中蒙边境时，周恩来接到吴法宪的拦截建议，马上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发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走吧”。虽然毛泽东这句话是在林彪专机起飞后说的，但从8341部队报告“上级”后仍按兵不动的态度看，毛泽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早在林彪专机起飞前就决定了。所以张宏的态度由积极转为消极，面对林豆豆的责难，左右为难，张口结舌。更奇怪的是，张宏还传达“上级”指示，让林豆豆他们也一起上飞机。如果林豆豆也上了飞机，那是什么样的后果？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林豆豆笔下的“康生、四人帮”并不是康生、四人帮，而是伟大领袖的代名词。林豆豆1980年写这份上诉材料时，由于时代局限，还顾虑重重。明明林彪、叶群就是首长、主任，她都加了引号，可见心有余悸。

#### 4、谁耽误了拦阻时间？

余汝信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们觉得‘九一三’的问题，主要的责任是毛，而不是林。”“九一三事件”的责任不是林彪，这话很对呀，但为什么余汝信又把“九一三事件”的责任推到林豆豆头上？为什么一再指责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中耽误了时间，先是耽误了“五天”，最后又耽误了“一个半小时”？

事实上，是谁耽误了拦阻林彪的时间？不是林豆豆，也不是8341部队，而是8341部队的“上级”，是毛泽东！

在1971年9月7日至9月12日的五天中，“九一三事件”还没有形成，或者说还处在量变阶段，并没有发生质变。林立果也只是酝酿，他（或者包括叶群）的三个方案中，北逃苏联只是最后的第三方案。9月8日晚上林立果回到北京，才开始展开第一方案试图暗杀南巡的毛泽东。与此同时毛泽东得到情报，也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快了“步伐”。9月12日中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这时林立果乱了阵脚，临时决定采取第二方案，南飞广州。林立果让周宇驰在北京负责，而他自己飞回北戴河。就在林豆豆请求8341部队保护林彪时，周宇驰等人还在布置第二方案南飞广州。

也就是说，在“九一三事件”前五天，并没有形成“九一三事件”，林豆豆并不清楚林立果到底有何具体打算，何来耽误？至于为什么不向林彪报告，林豆豆也解释了，因为这时候还没

有证据，如果林立果和叶群不承认，反而不好再进行工作了。

事后怎么说都是“诸葛亮”，而在当时，除了毛泽东，谁能预见到这样的结局？“九一三事件”有相当大的随机性，如果没有人告诉毛泽东林立果的行动，毛泽东何以突然回到北京？如果没有人告诉叶群毛泽东回到北京，林立果怎么可能在当晚飞回北戴河？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关于飞机起飞的“联合命令”和劝叶群不要夜航的电话，如果被“软禁”在人民大会堂的黄永胜可以接听电话，“九一三事件”就不是这样的过程了。而这一切都不能用林豆豆耽误解释得通的。

至于林彪上飞机前的最后一个半小时，更是与林豆豆“耽误”无关。8341部队始终没有接到“上级”的拦阻命令，何来林豆豆的“耽误”？

林豆豆在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申诉材料中写道：“结果，从96号楼（北戴河林彪别墅）到机场，从北戴河到山海关，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内，对我们的五次报告和请求，除了叫我们‘跟着上飞机’外，所采取的唯一具体措施，就是列兵荷枪不动和随后‘快追’。列兵不动和随后‘快追’所起的唯一作用是什么？这个作用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这一死无对证的结果的目的是什么？产生上述这个‘材料’不仅对在我找8341部队后长达近三个小时之久的时间内所急剧发生的众目昭彰的严重事实极力回避，讳莫如深，并因无法回避而玩弄文字，制造了谎言，颠倒了事实，混淆了是非。”

这才是“九一三事件”的真相！

#### 5、毛泽东南巡“胜券”不在握吗？

余汝信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说：“毛要整林而南巡鼓动，但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处理林？毛泽东并非胜券在握（否则他就不会南巡发动“诸侯”了）。”

余汝信怎么知道毛泽东“并非胜券在握”？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从毛泽东南巡的沿途谈话看，如果毛泽东“胜券”不在握，又怎么敢在南巡时如此大胆地一再“炮轰”林彪？打“草”惊“林”呢？

到1966年打倒刘少奇时，毛泽东耐心等待了好几年。林彪虽然没有刘少奇盘根错节的关系，也没有像刘少奇一样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但他是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握有“枪杆子”啊！不过从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口气看，他并不怕林彪“造反”。因为毛泽东始终没有像让国家主席给刘少奇一样，让出军委主席的位置，军队调动一个排，也要由他说了算。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对林彪采取的策略是乘胜追击，穷追猛打，直至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给军委办事组做了政治结论。但是，叶群和黄吴李邱都检讨了，只有林彪不检讨，稳坐“钓鱼台”。林彪不与任何人联络，没有任何反击行动。对林彪这种按兵不动的“软顶”战术，毛泽东确实无奈。所以他要南巡，狠狠地打“草”惊“林”！

总之，并不是像余汝信所说“只是在林立衡的报告后，毛才拿到主动权”，毛泽东早就“胜券”在握！

#### 6、林彪“主动出走”苏联？

余汝信认为：“按照林豆豆的观点，林彪是被叶群骗上飞机的，按照林豆豆材料中的叙述来说，林彪并不是被骗的，林彪很清楚他的目的是想跑到国外，林彪从没有夜航习惯，也没有

这样的先例，当天离开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跑到国外去。”

林豆豆的上诉材料中，观点和事例都同样指向林彪是被骗走的。林彪专机摔在国外，飞机上不仅仅有林彪，还有飞行员，有叶群，有林立果，余汝信又是如何证实“林彪离开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跑到国外去”呢？至于林彪第一次夜航，与“跑到国外去”并没有因果关系，难道目的地是国内就不能首飞夜航了吗？

余汝信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1971年8月毛泽东开始南巡并发表讲话，林彪预感毛会将他作为历史上中共的‘反党头目’看待，下场有可能会像刘少奇一样，林彪于是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准备一走了之。”“林彪不仅是有自主能力的，而且，他对此际自己的角色剧变心知肚明——这并非是堂堂‘副统帅’的一次正常出行，而是逃亡者前途未卜的一次仓皇逃命！”余汝信认为林彪事件不仅不是阴谋、也不是被叶群、林立果骗上飞机，而是一场与毛决裂后的出走事件。

表面看余汝信是在赞美林彪的“壮举”，但实际上是把“主动出走”强加到林彪头上！

林彪有什么理由“主动出走”苏联？

余汝信有什么证据证明林彪知道去苏联？

余汝信的证据是“叶群明确提出‘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时，林彪没有表态。其实，不表态至少也是一种未加反对的态度。”没有表态，就是“未加反对”，这是什么逻辑？难道就没有不同意的可能吗？再说，广州、香港和苏联是南辕北辙。余汝信拿这样的证据证明林彪知道北逃苏联吗？林彪还有一句著名的“民族主义者”的话，为什么余汝信不引用？这句话不是很清楚地说明林彪并不想逃往国外吗？

原来，并不是林豆豆在编织“林彪被骗”的神话，而是余汝信自己编织“林彪知道”的神话。

余汝信认为林彪是清醒的，又是自己上的飞机。

林彪临走前是否清醒，林彪自己从飞行员使用的简易舷梯爬进机舱，并不表明林彪知道此行是去苏联。林豆豆、林办秘书、工作人员以及8341部队没有人对林彪说起去苏联。叶群对林豆豆和林办警卫科长刘吉纯等人说去大连，林彪临走时向内勤交代也是去大连，还问“东西装上飞机没有”，却没有对任何人说去苏联。

余汝信猜测：林彪“所谓去广州或去大连，只是一种掩饰。”林彪临走说去大连怎么是“掩饰”呢？林彪想掩饰什么呢？林彪不是普通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工作人员的视线中。假设林彪知道去苏联，如此大的行动，他不可能“掩饰”得如此彻底，总会露出蛛丝马迹。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无论在北戴河，还是在北京，没有打过或接过电话，也没有主动接见谁，几乎是与世隔绝。林彪案审十年，林办工作人员“集中”审查了四年，面对面，背对背，除了李文普交代的“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之外，没有一个人揭发出林彪与“一谋两逃”（谋害毛泽东，南逃广州，北逃苏联）有任何关联，也没有揭发出林彪为去苏联做任何准备。而李文普揭发的林彪“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只是孤证，有种种理由证明林彪不可能说这句话。

余汝信对“德国之声”说：“从目前看到的材料，麦法夸尔的观点也是参与本书的学者一致的看法：‘官方说林彪要搞政变，我们没有看到林彪要搞政变的证据，而且说林彪要谋害毛泽

东，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林立果确实有一些想法，都体现在‘571工程纪要’中，但是这只是林立果几个人的计划，我们并不认为林彪知道和赞同他的这个计划。’”

而余汝信却要把《571工程纪要》算到林彪头上，他说：“集中体现了林立果真实思想的《“571”工程纪要》，……又何尝不是林彪此际内心的独白？！”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余汝信通过想象，把《571工程纪要》和林彪绑在一起，制造林彪主动出走苏联的理由？余汝信说：“林彪对文革的一套，已丧失热情”。“林家大难临头！思前想后，林彪、叶群、林立果横下心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一走了之！”余汝信“大声为林彪声（申）辩——主动走，又如何？！”

余汝信说的林彪“对文革的一套丧失热情”，“林家大难临头”就是林彪出走原因？林彪是自己上的飞机，林彪专机摔在蒙古温都尔汗，这就能证明林彪知道去苏联吗？难道没有别的因素让飞机在空中改变航线吗？

余汝信承认：“对于毛的心计，不能说林彪没有察觉，但林能做的，似乎只是消极应对而已。”但为什么余汝信又认为林彪临走说去大连是掩饰？是“主动出走”呢？

林彪“主动出走”还是“被动出走”，是研究“九一三事件”的关键之一。什么叫“主动走，又如何”？主动就是主动，被动就是被动，不能凭主观想象，需要确凿证据，在没有新的证据推翻林彪说去大连是掩饰之前，只能认定林彪就是要去大连。可是事实上林彪殒命在蒙古温都尔汗，那么叶群是怎样对林彪说的？去大连还是去苏联？这就牵扯到林豆豆所说的叶群骗林彪的问题了。

#### 7、叶群只有小事敢骗林彪？

余汝信对叶群的“骗”是这样解释的：“作为‘林办’主任，叶群为林彪应付外间（界）的方方面面。叶群的心态，是林彪不要操那么多心，有些既非原则又不那么要紧的事，就不告诉林彪，情有可原，那不是什么‘骗’，何况一般地说，所有‘首长’的老婆，都是会给丈夫挡事的。此外，有知情者称，叶群对林彪身体方面的照料，也是细心周到的。”余汝信认为叶群与林彪“荣辱与共，政治上是一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彪、叶群家事中无关大局的磕磕碰碰，远不能置换这个政治上的基本点。”“因此不存在叶群欺骗之说。”

余汝信把林彪在台上的“九年”一贯制了。林彪从1959年起主持军委工作，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止，这九年多时间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分为两段。以最初几年林叶关系类推这九年的林叶关系，就以偏概全了。余汝信说的“林叶一体”，应该截止到1965年上海会议前。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经常下部队调查研究。但自从1962年林彪累病了以后，毛泽东把军委日常工作交给贺龙，林彪退居“二线”，这一段时间林彪曾让叶群替他下部队搜集过材料。这时候，确如余汝信所说“林叶一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和叶群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余汝信仅举出“文化大革命”前的两个例子，并不能说明“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叶关系。林豆豆说“叶群骗林彪”，是特指“文化大革命”。随着林彪地位上升，叶群这个“林办”主任也被毛泽东提名为政治局委员，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加上毛泽东插在中间，林叶关系就开始复杂了。

这一段如稳定军队，打压军内造反派，保护老师，在庐山上反张春桥等，林彪、叶群在政治上还是一致的。叶群不会伤害林彪，因为伤害林彪就是伤害她自己。但是，不伤害林彪与不欺骗林彪能完全划等号吗？叶群对林彪身体方面的照顾，替林彪挡事，为林彪应付方方面面，与“骗”有逻辑关系吗？“细心周到”就不能“骗”吗？叶群自认为对林彪有好处的“骗”，不

也是一种“骗”吗？

余汝信的话让人想起李文普所说“叶群小事敢骗林彪，大事不敢骗”，而且更进一步具体化了。

叶群“骗”林彪的事情很多，例如林办秘书谈到的叶群瞒着林彪去开会，瞒着林彪到江青那里探听消息，以及叶群为进政治局的活动等。怎么能说叶群只是在小事上骗林彪？

而且什么事大，什么事小？只要敢骗林彪，就无所谓事大事小，小事敢骗，大事为什么就不敢骗？更何况大事小事是可以转化的。林彪出行是小事吧？都由叶群一手掌控。1969年8月，林彪从井冈山返回要去南昌，而叶群瞒着林彪，命令飞机直飞北戴河。这不是骗林彪吗？这个事是大事还是小事？林彪最后一次出行，还是由叶群安排，说去大连，却摔在蒙古温都尔汗。看来1969年井冈山改变行程为两年后的九一三事件作了注脚。

#### 8、林叶怎能和毛江相提并论？

余汝信把林叶关系和毛江关系类比，认为林豆豆“强行切割林叶”，“就如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强将毛泽东、江青进行政治上的切割一模一样。官方称，坏事都是江青干的，毛是被江所利用；林立衡则说，‘坏事’都是叶群做的，林彪是不知情或被骗的，两者显然都不是事实。”

余汝信说的是就是事实吗？

首先，林豆豆没有“强将林、叶进行政治上的切割”。其次，林叶和毛江完全不具备可比性。众所周知，毛泽东手握实权，江青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大都出于毛泽东的授意或默许，比如组织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炮制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革”中操控中央文革碰头会，鼓动造反派造反，打倒陶铸，参与中央专案组负责刘少奇专案等，江青都是毛的“过河卒子”，冲锋在前。而林、叶却完全不是这样。林彪的接班人只是一个空架子，并不负责中央任何具体事物，一切唯毛马首是瞻。林彪出于政治和身体的原因，从不热心政务，常常开会请假。正因为林彪的“躲”，“文革”中毛泽东让叶群代表林彪出席会议，负责上传下达。叶群除挂名政治局委员外，并不负责党政军的具体工作。从政治角度来看，林叶与毛江的关系相差十万八千里。

《邱会作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毛说要对“文化大革命”负责，周马上把责任揽过来。事后邱问林为什么不说话。林彪回答，我不能说话，我一说责任又推到我头上了。林彪深知官场险恶，不愿意当替罪羊，不愿意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摇旗呐喊，以身体不好为由不参与政治局会议，也不让叶群抛头露面。而毛泽东拉不动林彪，就强拉叶群“入伙”。

余汝信说：“对叶群职务和政治地位的提升，林彪也没有坚决反对。”林彪怎么能坚决反对？叶群进政治局是毛泽东之意，林彪把叶群的名字从政治局预选名单上划掉，还不是坚决反对吗？毛泽东再次把叶群的名字写上，周恩来又做工作，林彪还能再反对吗？正如林豆豆所说，在林之间，叶群只能骗林彪。叶群骗林彪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当然，叶群很清楚她成了毛泽东的“枪”，小心翼翼防着毛泽东，能不去的会议就不去。但毛泽东在需要叶群出席时，就休会等着。在这种情况下，叶群不敢得罪毛泽东，只好委曲求全。但她和林彪一样事事不表态，被林办秘书称为“叶推事”。

余汝信说：“目前并没有材料揭示，在九年多的时间里，林彪对叶群（更多的是代表林彪本

人)参与军委和中央的工作有何不满。”

目前,有材料揭示叶群参与军委和中央的什么工作了吗?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没有更多指示,唯一声名远扬的是1969年国庆节前,林彪在北京对总参副总长阎仲川、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指示,疏散西郊机场的飞机。国庆节后,林彪视察张家口驻军,然后到苏州,让秘书张云生给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他关于防止苏联突然袭击疏散部队的指示,即所谓的“林彪第一号令”。这一段林彪为战备做的这几件事“轰轰烈烈”,瞒得了谁?如果林彪还有背着毛泽东给军委办事组的指示,早被批判得底朝天了。叶群虽然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她只是挂名,林彪不让她干预军委办事组的事情,叶群对军事也一窍不通,很少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按邱会作的说法,军委办事组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既然叶群没有参与军委和中央的工作,林彪何来满意或不满?

## 9、林彪不知毛要打倒罗瑞卿

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林彪对此一无所知。但“好几个同志”提议林彪向毛泽东报告罗瑞卿的问题,林彪却一直压着,看来这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让叶群转交,并带去揭发罗瑞卿的一些材料。信中林彪强调自己只是“中转站”。

让叶群转信这件事本身就不正常。

林彪未出山前,不是毛泽东到林彪那里,就是林彪到毛泽东那里。而这次毛泽东要整罗瑞卿,却完全不与林彪通气。林彪摸不清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如果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可是毛泽东始终没有找林彪面谈罗瑞卿的问题。至于叶群在毛泽东那里谈了那么长时间,林豆豆在她的申诉材料中有详细披露。是毛泽东问东问西,引出了罗瑞卿与林彪关系不睦的由来,打开了叶群的“话匣子”。

林彪一向与人为善。战争年代如此,解放后仍然如此。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对军队的政治工作不满意,把总政主任谭政降为副主任,并没有一棒子“打死”。“文化大革命”中,除了不得不对被打倒的某些人表态外,林彪几乎没有直接出面点名,这与江青、康生,甚至周恩来,都有明显的区别。不仅如此,林彪还尽力保护自己的下属。

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林彪也是与人为善的。从林彪内心说,罗瑞卿有能力,又肯干,他是不愿意把罗瑞卿拉下马的。可是罗瑞卿惹了众怒,“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向林彪告状,林彪不能不对罗瑞卿进行严厉的批评,但批评不等于打倒。

诚然,参加上海会议的军队将领如叶剑英、杨成武等知道上海会议是针对罗瑞卿的,叶剑英给很多人打了招呼,也与林彪也交换过对罗瑞卿的不满。林彪知道上海会议是针对罗瑞卿的,据邱会作回忆,林彪对他和李作鹏说,罗瑞卿的问题由中央解决。但是,毛泽东是否会像1959年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一样,把罗瑞卿打倒,林彪并不知道。在1965年上海会议前,毛泽东没有和林彪见面,毛泽东在接见叶群时,也不可能把打倒罗瑞卿的意图告诉叶群。毛泽东要如何处置罗瑞卿,是打倒还是虚晃一枪,林彪和所有军队领导人一样,都不知道。

历史事件要放在当时看,而不是事后。上海会议后当然都知道罗瑞卿被打倒了,而上海会议前,正像林豆豆所说,林彪、叶群不知道上海会议整罗。虽然林彪通过叶群向毛泽东报送了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表面是罗瑞卿是要挨整了。但有高岗、彭德怀的前车之鉴,实际上毛泽东

到底要整谁，林彪、叶群心中无数，没准最后挨整的是林彪自己。

林彪的担心不无道理。谁能忘记高岗和彭德怀的下场呢？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让高岗搜集打倒刘少奇的材料，没想到辛苦搜集材料的高岗被打倒了，而后来刘少奇却升了国家主席，与毛泽东平起平坐。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泽东让彭德怀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评总参谋长粟裕三次擅权的错误。粟裕没有作组织结论，调到军事科学院当叶剑英的副手，黄克诚接任总参谋长。一年后，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被毛泽东革职。

1965年12月2日，林彪报送《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55师紧急战备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在批示中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林彪看到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心中能不忘忌吗？毛泽东没有点名，是仅仅把矛头指向罗瑞卿吗？林彪一向认为“折中主义”没有错，虽然他积极主张突出政治，但毛泽东会不会“倒打一耙”？毛泽东让叶剑英、杨成武等几个人找林彪谈罗瑞卿的问题。林彪不得不让叶群搜集罗瑞卿的材料，至于最后被打倒的是罗瑞卿，还是搜集罗瑞卿材料的林彪？林彪心里并没有底。叶群当然不希望林彪倒台，所以她在毛泽东面前拼命表现，在上海会议上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安排发了言，试图与罗瑞卿划清界限。以致使人感到叶群代表了林彪。

对中央会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只有重要发言才会被整理成会议文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党。如果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十分重要，为什么不作为上海会议的文件下发？仅仅拿叶群不同意说不通。叶群再不同意，总不能违抗“组织”吧？

事实上，对于上海会议倒罗，林彪既没有出面发表指示，也没有亲身与会，这不正表明了林彪的态度？否则他至少会像庐山会议批彭德怀那样站出来说话、表态。

总之，打倒罗瑞卿与林彪无关。

林豆豆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材料仅仅是个人的回忆和申诉，因各种因素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认为，林豆豆是严肃的、认真的，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揭开了“九一三事件”真相的盖子。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对林豆豆的“围剿”却一直没有停息。除了当年中央专案组的横加指责，还有人屡屡抛出林豆豆被迫写的或被改写的交代材料，以此想封住林豆豆的嘴。

但是，“九一三事件”的真相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的。

我们相信，“九一三事件”终会真相大白！历史也终将证明，林豆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回忆是正确的！

□ 原载《新史记》总第15期，2013年8月

~~~~~

【当事者言】

参加罗瑞卿专案组屡遭批判审查

• 张英华 •

一、奉命参加

1966年底，总政保卫部接总政通知，让派一名副处长参加中央专案办公室工作。保卫部的两位副部长找我谈话说，经部党委研究决定，派你去参加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明天你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报到，接受新任务。12月30日，我按时到达后，总政主任萧华同志主持会议，他说：“康生同志几次来电话，督促我们成立罗瑞卿专案组，今天到会的同志都是专案组的成员，我们这个专案组就算正式成立了。”接着，他讲了专案组的任务、纪律，还特别强调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等。参加会议的有：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郑翰浩、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柴瑞林、原罗瑞卿办公室秘书邓汀、总参作战部副处长王亚志、总政组织部干事胡奇、还有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

1967年1月3日，专案组在萧华主任的一间大办公室内开始办公。除郑翰浩和公安部的副局长未来外，我们五个人首先把1965年12月上海会议、1966年3月京西宾馆会议、1966年4月公安部会议、以及各地揭发的有关罗瑞卿的材料收集起来，按照揭发问题的性质分成几大类，然后再把需要调查的问题列出提纲，摘录在卡片上，准备外出调查时使用。4月以后，又从公安部调来5位同志参加专案组工作。由于“造反派”几次冲击国防部大楼，我们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8月，叶群带人来查封了专案组的所有材料，萧华同志也被“造反派”多次“揪斗”，他已无法领导专案组的工作。10月，“二办”成立，罗案划归“二办”由军委办事组直接领导。郑翰浩、柴瑞林、胡奇同志回原单位。杨成武同志任组长，派总参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许心荣同志来任副组长、支部书记。又从海军、空军、二炮和各军区调来6人，全组共15人。由于人员增多，工作量增大，许心荣同志一人忙不过来，需要有个帮手，再加我对公安业务比较了解，对案情比较熟悉，所以在12月时增补我为副组长。办公地点搬到翠微路的总参招待所。

二、挨批后被撵出专案组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杨成武同志成了“阶下囚”，吴法宪接任了专案组组长。他一上任，就采取了几个措施。首先，他把“汪金祥专案组”和“18号专案组”（即给江青写匿名信专案组）合并到“罗瑞卿专案组”成为一个大组，统称“罗瑞卿专案组”，下设三个分组，但又互相保密，不能互通案情。其次，把公安部调来的5位同志和邓汀（罗瑞卿的秘书）同志调出专案组（注：公安部的5位同志3月中旬回公安部学习班），调来海军的张晓山同志担任常务副组长、支部书记，许心荣、张英华、傅旭臣、朱铁铮（空军党办秘书，后成为“小舰队”成员）、孙文学、谭园丁等七人均为副组长。办公地点也由翠微路招待所搬到京西宾馆九层。1968年10月底，在一次支委会上，朱铁铮等人提出：“在专案组内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右倾思想，有的人精神状态有问题，需要进行批判。”随即发动了一场为时一个多月的反“右倾思想”的斗争。受批判的重点对象是：王亚志、许心荣、张英华三人。批判会议结束后，1968年11月27日，三人前后被撵出了专案组，结束了参加将近两年的专案组工作。

他们为什么要突然发动这样一场兴师动众的批判“右倾思想”的斗争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办案的指导思想、政策掌握上，甚至在一些具体做法上，都和当时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甚至对立。所以，必须除之。

一件事是关于罗瑞卿同志的国民党特务问题。1967年7月，康生在一次会上指示专案组说：“罗瑞卿有个特务老婆叫拱平，现在南京，你们去把她抓起来进行审查，从中发现罗瑞卿与国民党特务的关系。”专案组派我和另外三位同志去南京把拱平（某中学教员）带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没有发现她是国民党特务的证据材料。在一次汇报案情的会议上，我们汇报了对拱平审查的情况，说明没有查出她是特务的有力证据。当即受到康生的

严厉批评，他说：“拱平是老特务了，这是肯定的，无疑的，在延安时就有她的材料，材料就在调查部。”这太好了，既然拱平的特务问题早已肯定，又有证据材料，就不要再审查了，把材料拿来就行了。于是我们就写了个报告，经批准，我到西苑调查部去借来了材料。管材料的同志一再强调：“这是康老在延安时交社会部保存的，用完后一定要还回来，千万不能丢失。”我还给打了借条。我拿回来的所谓“证据材料”，只不过是四个日记本和一个小笔记本。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她的日记看完，日记详细地记述了她离开南京金陵大学和另外三个男生经上海、杭州、庐山、武汉、西安到达延安的经过，以及进入抗大女生队学习的情况，从几本日记的内容看，证明不了她的特务身份。但我还是把日记中的所有疑点，列出了几十个问题，作为审问提纲向她提问，每问她一个问题时，她就大吃一惊，她说：“你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做的真细，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调查得这么详细具体呢？”她绝不会想到她30年前所写的日记内容提供了线索。我们又到黑龙江等地找到和她一起到延安的那三个男生进行调查。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仍然无法取得她是特务的有力证据。1968年5月，我们写了一个报告，说明没有发现拱平是特务的证据材料，建议把她放回南京，由原单位继续进行审查。在一次会议上，因为这个报告，又受到康生、吴法宪的严厉批评。康生一再说：“拱平是老特务了。”我们也多次汇报说没有拿到有力的证据材料，不能定她为特务。为此，又多次受到他的严厉批评。后来我们知道的真实情况是：拱平和罗瑞卿同志结婚后不久，她说她得了“脏病”，要求到西安去治病。这时，组织上已经怀疑她政治上有问题了。康生当时在一个会议上曾说过“坦克（堂客的谐音，即老婆）开到床上了”，就是指她说的。那时对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了怀疑但又无确凿证据的人，采取“礼送出境”的政策，所以就同意她去西安（后去了重庆）治病，以后她再也没有回来。在她出境时，边防检查站把她的日记本和笔记本都扣下了，后送社会部。康生就认定了这些日记本就是拱平特务身份的证据材料。因为拱平问题，在反“右倾思想”会议上，作为我“右倾错误”的事例之一受到批判，让我在大小会议上作了多次检查。

另一件事情是1967年底，从“二办”转来一份揭发材料，材料中说，上海监狱中有个在押犯人，是个老中统特务，据该犯供称：上海刚解放时，在大街上遇到另一个中统特务杨宝昌，杨宝昌告诉他：“北京公安部的罗部长也是我们的人。”就这样一份极端离奇的材料，到了康生、江青等人的手中，却如获至宝，立刻派许心荣等人乘专机到西宁，把杨宝昌押来北京。我们几乎是天天去审他。我还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北京秦城监狱提审过多名在押的老中统特务。经过4个多月的审讯和调查，没有发现任何与罗瑞卿有关材料。从杨宝昌的年龄、经历、参加中统的时间、从事特务活动的地区来看，无论如何也和罗瑞卿联系不到一起，我们认为，杨宝昌和罗瑞卿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关系。因为罗瑞卿同志从1929年3月进入苏区后，从未离开过红军，他又不会分身术，一半在苏区当红军，一半在上海当特务。而康生等人就是抓着这个线索不放，非要拿杨宝昌作为“突破口”，拿下罗瑞卿的特务问题。我在案情分析会上经常说，认定一个人是特务，必须弄清他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经过什么人介绍、参加了什么特务组织、担任过什么职务、进行过什么特务活动、领取过多少特务活动费，等等。弄不清这些问题，就不能定为特务。有人就坚决反对，说我这是“条条框框”，是“修正主义货色”。在批判我“右倾思想”时，这又是我的严重错误之一。

还有一件更为离奇的事。1968年夏，许心荣同志交给我一份揭发材料，是长春监狱的一个在押犯人写的，有几十页厚。材料中说，罗瑞卿成立了一个反革命“人民党”，像电影中描写的那样，和女流氓们吃喝玩乐，无耻下流，把罗瑞卿描写成了一个“黑社会”的头子（幸亏这份材料没有落入康生、江青之手，否则很可能又会像对待杨宝昌那样，将写材料的人抓来北京，审查个没完没了）。我看完材料后还给许心荣同志。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太离奇了！纯粹是胡说八道，故意把水搅混。”他听后没说什么，顺手拿起一个大信封，把材料装了进去，用毛笔在信封上写了三个大字“离奇卷”。他忘记了里面还有一份黄永胜揭发罗瑞卿历史问题的材料。送到保密室后被人发现了，说他竟然把黄总长的揭发材料列入“离奇卷”，这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凡此种种，早已有人向吴法宪等人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支持和指示，他们又在专案组内秘密串联，经过周密策划后，于10月下旬，发动了一场全面系统地清算批判以王亚志、许心荣、张英华为主的“右倾错误”大小批判会，参加会议的有50多人，持续开了近一个月。会上，有几位主持正义的同志刚说了几句公道话，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多人的围攻。1968年11月23日，批判大会结束，宣布：王亚志押送回总参，继续审查。11月27日，又宣布：撤销许心荣专案组副组长、支部副书记职务，送回总参政治部；张英华回已经被军管的总政，参加“学习班”。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先后被撵出了罗瑞卿专案组。其实，我在专案组工作期间，整天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如走雷区，如履薄冰，深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粉身碎骨或遭灭顶之灾。现被撵出专案组，如释重负，内心窃喜。

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审讯人员中也颇具有正义感的人，他们对吴法宪这一伙的做法表示了怀疑，结果被说成是‘右倾’，撵出了专案组。”苍天有眼，终于有人为我们三人蒙受的不公正待遇说了几句公道话。

三、粉碎“四人帮”后三次被审查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到1986年的十年中，因为我在罗瑞卿专案组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对我进行了三次审查。

第一次是1976年到1978年，由中央组织部和总政保卫部派人参加，成立了一个“七号办公室”，专门负责审查曾在中央一、二、三办搞过专案的人员，重点是副组长以上。地点设在中组部。对我的审查结果是：我在罗瑞卿专案组工作期间没有问题，可以不做结论。

第二次审查是1982年至1983年，这次是军事学院党委（当时我任军事学院院务部副政委）根据彭真给彭冲写的一封信，要对参加过中央专案一、二、三办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的指示精神，组成了有军、师职干部参加的调查小组，对我在罗瑞卿专案组工作期间的问题进行审查，这次他们找了很多知情人，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取得了很多证明材料，院党委听取了几次汇报后，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搞了不到两年时间的专案，有大量材料证明我在罗瑞卿专案组工作期间表现是好的，是能够坚持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且能抵制一些错误的东西。党委决定，让阎生（政治部副主任）代表党委找我谈话，告诉我在罗瑞卿专案组工作期间没有任何问题，且表现是好的。故不做文字结论，材料也不装个人档案。这个问题就算清楚了。

第三次审查是1984年至1986年，这次是由总参牵头十几个大单位（总参、总政、总后、海军、空军、二炮、北京、南京、沈阳、广州、乌鲁木齐军区）派人参加的“联合调查组”。根据全军整党办公室1984年9月18日《关于调查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二、三办公室军队办案人员问题的通知》进行审查的。这次审查，时间之长，人员之多，规模之大，耗资之巨，远远超过以往的两次。他们先后到总政干部部、中央档案馆、秦城监狱等单位，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他们还找了众多的原办案人员进行了调查，也取得了大量的旁证材料。最后的结论仍然是：“张英华同志在罗瑞卿专案组工作期间没有问题，不做文字结论，材料不装个人档案。指定基层党组织口头通知本人。”于是，1986年10月28日下午，国防大学第一干休所（我已离休在此）所长和总支书记找我谈话，他们说：“受原军事学院整党善后工作小组的委托并代表干休所党总支口头通知你：你在罗瑞卿专案组工作期间的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了，没有任何问题。”我问：“有文字材料吗？”他们说：“有个文字材料，那是联合调查小组给领导作参考的《调查报告》，是不和本人见面的。我们来时，向阎生同志提出，如果材料不和本人见面我们就不去和他本人谈话。阎生同志说，那就给他看看吧。”说完后他们拿出了一份题为《关于

张英华同志在原中央专案罗瑞卿专案组工作期间情况的调查报告》。我看完后提出要复印一份，他们说，那是总参写的，不是我们的报告；那是给领导看的，不是和本人见面的，你看看，摘录一下就行了，我再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件事从此就算结束了。

使我不能理解的是，本来1979年11月3日，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联合发过一个文件，内容是：“利用专案迫害老干部，责任主要在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等人，办案人员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自觉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不应追究他们的责任，这一点应向参加过一办工作的同志说明。希望他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揭发，协助组织，共同把专案工作总结做好。”这个文件是非常正确的，我曾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写了揭发江青、康生、吴法宪等人利用专案迫害老干部的材料。但是，1982年的中央55号文件，关于清查“三种人”的通知中，要求对搞过专案的人员进行审查并“记录在案”。彭真在全国政法会议上的讲话和给彭冲的信，都要求对参加过中央专案一、二、三办的人进行严格审查。（注：2003年初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第501页载“公安部机关处理原一、二、三办专案人员”一段，称：“7月26日（指1982年——引者注）283名原中央一、二、三办专案人员集中参加轮训学习，加上1983年开始整党学习共历时二年结束。”501页末尾写有：“对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进行了组织处理。”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追究那些诬告陷害他的人，追究那些给他先定罪的人，而不是办案人员。即便他们在办案过程中，有什么缺点错误，那也只是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而不应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个别违法乱纪者除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真可谓：仰问苍天天无语，低头沉思也茫然。好在时代在进步，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但愿今后再也不会出现像过去那样的冤假错案了。

（作者为国防大学离休干部，公安部离休干部汪春耀整理）

□ 原载《世纪》2013年第4期

~~~~~

## 【文革一页】

### 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 张一虹 •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了章诒和女士的《张伯驹的文革“交待”》一文，虽然只是篇2000多字的短文，但我在读过之后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并不亚于读她《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的感受。这不仅是透过张伯驹的“交待”材料，能想象到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无奈，更因由此而让我想起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老先生时的情景。

#### （一）

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省文化局机关党组书记金树然大会。在押解金书记入场时，他昂首挺胸，正气凛然，颇有许云峰赴刑场时的悲壮架势。在有伟大领袖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面前，又岂能容忍这等嚣张气焰？于是便呼啦啦地扑上几个人来，立即将其打翻在地，然后就迫使他跪在偌大的体育馆中央。一浪高过一浪“打倒”的口号声，如海啸般地掠过，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心惊肉跳。所以批斗会从一开始就铺垫出了十分恐怖的气氛。

这自然就促使在此后各单位代表的发言中，每提到某个当权派或某个人的“罪行”时，便

有人跟着起哄：“把他揪出来！”“让他下去跪着！”于是全场与会者的应和下，被点了名的人，就得乖乖地跪在金树然书记的一旁，随即便会有人立即上前去给他（她）剪发剃“鬼头”。随着发言者的不断增加，跪在那里的“牛鬼蛇神”也就在逐渐地增多。更出人意料的是，有个人在喊“毛主席万岁”时，因没有举左手，而是举了右手，也立即被揪出跪在了下边。由于我担心自己也可能举错了胳膊，从而引出飞来之祸，所以就将右手紧紧地缠到挎在肩上的书包带子上，使其不能轻举妄动。

就在如此人人自危的气氛中，省博物馆造反派的代表上台发言了。当他在控诉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招降纳叛的“罪行”时，突然拉着长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大右派张一伯一驹！

然而就在发言者对这段批判的内容尚未终止，会场里还没来得及响起“把他揪出来”的喊声时，只见在离我们不远处看台上的最后一排，立即站起位穿着白衬衣的长者，然后便匆匆挤出身子，顺着看台的过道，一路小跑着奔了下去。我注意到在整个批斗会期间，他跪在那里始终是低着头，从未侧脸旁视过一眼。

因为我是此前一年从学校毕业，刚刚由北京来到长春，然后就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所以不仅对本系统的一切情况不熟悉，对这位叫张伯驹的，就更不知他是何许人也了！

“此人很坏——袁世凯当年搞复辟要当皇帝，就是他资助的。”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同事，低声对我说。

无知的我，当时就在心里嘀咕道：“这样的人，才是应当清除的历史垃圾呢！”

当批判发言结束时，想不到会场里竟掀起了一个更大的高潮：有人勒令那几十个“牛鬼蛇神”，沿着椭圆形的跑道，爬着向全体与会者去示众——于是整个体育馆又是一阵骚动、惊呼……

伴着这支由省文化局机关党委书记领衔向前爬行的队伍，是震耳欲聋的、有节奏的口号声。渐渐地，有些年老体弱的人，向前蠕动的速度有些放慢了，落后了。当他们爬行了一圈之后，示众者中间年龄最大的张伯驹，竟完全被甩在了最后面，以至于距离越来越远，直到他的两只胳膊再也不能伸屈，终于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全场的“观众”都将目光集中到他那里，禁不住让人担起心来：是体力不支呢，还是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面对着此情此景，是否有人会趁机把他拉出去，让其停止爬行，或者可能还会引来一顿拳脚？

人们正在心里这样嘀咕着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彪形大汉快步奔了过去，弯腰就拽住了张伯驹的衣领——于是，此人就如同拖着一具尸体，或者是一件什么沉重的东西，迅速地跟在了那个爬行队伍的后面，向前奔去……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当一个人被拖拉着与地面摩擦时，是一种什么感受，更不知道这位老者若是真的犯了病，经过这样的折腾，那后果又将如何？

示众“表演”在继续着，可不知是什么原因，原先那呼喊的口号声，却渐渐地低沉，又逐渐地稀稀落落，直到后来，似乎又都全部消失了。

在这突然的寂静里，人们似乎只能听到那艰难的爬行声和被拖拉时的“嚓嚓”声……

终于，又示众了一圈之后，这漫长的爬行总算是停止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张伯驹静静地躺在那里……

(二)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将长春市几个造反派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我被临时抽调到吉林省博物馆去参与筹备《四个反革命组织展览》。因为该展览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另一个楼里独立活动，与博物馆基本不发生什么联系，因此并没有机会能见到张伯驹。可是有一天早晨，因事我到博物馆的主楼去，刚推开门进入前厅，突然发现该单位那位造反派头头，女解说员××，正向站在她面前的一位老者在训话。仔细一打量，我不禁一怔：此人不就是那位张伯驹吗？

只见他光着头，身着一件棕色的对襟小棉袄，脚上是一双矮腰的布棉鞋，显得还算整洁；他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并将头偏向一侧；眼皮下垂着，似乎是在认真聆听，又似乎是在似睡非睡。突然，我发现有一丝鼻液从他的一只鼻孔里流了出来，是越流越长。而他却像是根本就未发觉似的，始终就没去理会它……

我每天都能从安在楼外的大喇叭里，听到这位女头头所播出的，打派性的文章，那真可谓是铿锵有力。而此时的训斥，当然也是明快、清脆。可就在她将要结束训话之时，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她将一面小铜锣和一个敲锣的锤子递了过去：“去！到人民广场转一圈再回来。边走边敲，嘴里也别闲着。要念叨：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听着没有？”

“嗯嗯！”张伯驹十分痛快地答应着，眼睛也陡然睁开了。凝固的身子也立即动了起来，然后就接过那个家什，竟没看对方一眼，就脚步轻快地奔向门外。我知道，人民广场距这里足有一趟街的路程，此时竟也禁不住地跟了出去。

望着他的背影，听着那一声声的锣声，以及“我是大右派”的自语声，我的心久久地不能平静……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四十五六年了，许多人生坎坷的，或者是心酸的经历，都已慢慢淡忘了，但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伯驹的这些镜头，却刀刻斧凿般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历历在目。粉碎“四人帮”之后，有机会能够读到不少有关张老先生的回忆，心中不断升腾着的是对他的崇敬和钦佩。想他对国家的贡献，想起他的遭遇，特别是一想到他在临去世前，竟因“不够级别”而进不了病房，只好躺在走廊里的那一幕，就禁不住地在心里道：“我们实在是对不起张伯驹呀！”——可是这个“我们”又应当都是谁呢？

□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